

中国云南傣族与印度阿萨姆邦傣族

母语教育比较研究¹

李 强¹、杨光远²

(1. 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2. 云南民族大学 东南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 历史语言学研究认为, 中国云南傣族和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是同根同源民族, 对两地傣族的母语教育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在历史上他们的母语教育方式、民族文化认同感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相同; 当代中国云南傣族的母语教育在政策保障、经费支持、课程教学、社会环境等方面均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 发展势头良好, 而印度阿萨姆邦傣族的母语教育由于不受政府重视, 处于民间自发开展状态, 部分地区的傣语传承甚至面临濒危。

【关键词】: 母语教育; 傣族; 中国云南; 印度阿萨姆邦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8) 07-0146-05

一、中印傣族的源流

傣族是中国历史比较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傣族与我国的壮族、侗语支民族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越南、印度等国的傣、泰、掸、老、阿洪傣等民族同源于中国古代的“百越”族群。在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 不同地域的傣族所受的社会环境文化影响不同, 原先特有的“百越”族群文化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 但共同的语言文化特征依然保留和传承下来。中国的傣族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王国。据汉文史籍记载, 公元前 2 世纪, 滇越人(百越民族的一支系)在滇西德宏一带建立了“乘象国”。之后, 出现了“掸国”“果占壁王国”“景龙金殿国”等部落王国。元、明、清时期, 中央王朝在傣族地区实行了七百多年的“土司制度”。^[1]

中国境内的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的总人口 114.2 万, 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 100 万的少数民族之一。^{[2] (P25)} 据古文献《华阳志·南中志》记载, 傣族起源古代百越民族,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 古越民族从江浙一带沿福建、广东、广西迁徙到云南。之后, 有一部分古越人从云南迁徙到泰国、缅甸、老挝和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西汉以来, 定居在云南的傣族有一部分断续地迁徙外, 大部分一直稳定地生息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边境区域。

¹【基金项目】: 2017 年度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 (17ZDA317)

【作者简介】: 李强 (1964-), 男 (彝族), 云南芒市人,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文化比较语言学研究; 杨光远 (1952-), 男, 云南陇川人, 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

历史以来，云南的傣族一直保留和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维系着本民族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的传承教育。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语言。从语言使用现状看，云南边疆傣族聚居地区主要使用着傣语（母语或第一语言）、汉语（第二语言）和缅甸语（第三语言）。云南傣族的母语分傣语德宏方言、傣语西双版纳方言、傣语红河金平方言和傣语玉溪新平方言四大方言。其中傣语德宏方言的活动区域和使用范围覆盖了中国云南德宏地区、缅甸的掸邦地区和印度的阿萨姆邦莫兰地区一带。

印度的傣族主要分布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莫兰和库阿瓦提一带。阿萨姆邦位于印度东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区域，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是中国西藏，下游是孟加拉国，阿萨姆邦与中国、缅甸、不丹、孟加拉国相邻。阿萨姆邦的土地面积有 7.8 万平方公里，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族自称“阿洪傣”（Tai Ahoms），人口近 400 万，占阿萨姆邦总人口 1900 万的 21%。“阿萨姆”一词，源自巴利语，在印度当地语言中，“阿”是“不”之意，“萨姆”指“孟族”（缅甸最古老的土著民族），“阿萨姆”指“不是孟族”之意。“傣阿萨姆”（Tai Assamese）是对印度阿萨姆邦所有傣族的总称。印度阿萨姆邦阿洪傣是其中的一支。这一支又分 6 个小支系，分别是：傣阿洪、傣帕吉、傣罕迪、傣艾顿、傣罕幸、傣堵龙。^{[3] (P48)} 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族 70% 的人口从事农业，以种植水稻和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茶叶、棉花、甘蔗和烟草，这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传统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基本相同。长期以来，印度阿萨姆邦傣族保持使用着印地语、英语、阿萨姆语和阿洪傣语等四种语言。在一定意义上讲，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是一个与中国傣族有着同根同源亲属关系的典型的多语接触共生的民族。印地语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印地语支语言，这个语支的语言主要有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等。

根据国内外学界对印度阿萨姆古傣文文献《阿洪莫兰吉》，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在公元 1218 年，召弄（德宏傣语“大王”之意）思嘎法率九千人马从勐卯（今德宏瑞丽市）出发，途径嘎弄勐晚（今德宏陇川县），勐腊（今德宏盈江县），勐底（今德宏梁河县），然后沿南鸠河（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游）经过缅甸的迪巴姆和勐哈棚，最终到达印度阿萨姆邦地区定居下来，在那里繁衍生息，生活至今。泰国清迈大学泰语教师列努·威查欣副教授翻译的傣文古籍《阿洪莫兰吉》，是一部关于印度阿萨姆邦阿洪傣人由中国迁徙到印度阿萨姆邦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部分。^[4] 我国的傣族文献中，有一部分史料和《阿洪莫兰吉》中有关“阿洪傣族”头人的称谓和在位年代的记载，比较明显的是史料中有关当时的社会官衔职位的名称以及社会组织形态和管理体系的设置与中国德宏傣族历史上同期的语言使用相似度很高。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国云南的傣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族在族源、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和密切的同源关系。

二、中印傣族母语的同源关系

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情感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迥然有别的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民族的特定思维模式无不依靠语言才得以形成、积淀、发展和传承。

我国傣学专家杨光远先生在其《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一书中，^[5] 对用印度阿洪傣语编写的编年史《阿洪莫兰吉》和中国德宏古傣文文献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印度阿洪傣语和中国德宏傣语在语言文字方面有不少相同之处，通过追溯这些相同之处的历史成因，可以佐证中印傣族的同根同源关系。归纳起来，印度阿洪傣语和中国德宏傣语在语言文字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最为明显的相同之处。

（1）《阿洪莫兰吉》中原始使用的古傣文所记载的有关印度阿洪傣迁徙之前的坤龙坤莱时代（大约公元 1200 年～1539 年）的内容和词语，与当时中国云南德宏瑞丽傣王国使用的古傣文的文字拼写以及词语的结构基本一致，文献中都没有掺杂任何外来词语于其中。^[5]

（2）在词语的声母系统中，阿洪傣语的声母“ph”和“f”合二为一，阿洪傣语的声母“ph”与德宏老傣文一致；阿洪傣语的声母“d”标记为“l”，“b”为“m”，“r”为“h”，阿洪傣语的这 3 个声母与德宏傣文古音的“d”为 T，“b”为“m”，基本一致。如，天干地支中的甲乙丙丁，“甲”在阿洪傣文里的拼写是/ka: p/，在德宏傣文里的拼写也是/ka: p/；阿洪傣的“乙”是/da: p/，德傣文是/la: p/；阿洪傣的“丙”是/ha: p/，德傣文是/ha: i/；阿洪傣的“丁”是/mə ŋ/，德傣文也是

/məŋi/; 阿洪傣的“子”是/tsai/, 德傣文也是/tsai/; 阿洪傣的“丑”是/pau/, 德傣文也是/pau/; 阿洪傣的“寅”是/ŋi/, 德傣文也是/ŋi/; 阿洪傣的“卯”是/mau/, 德傣文也是/mau/。^[6]

(3) 从阿洪傣文的声母特征看出, 德宏傣文早先有过边辅音/b/, /d/, /g/, /r/, /n/以及带前喉塞音的/b/, /d/, 有过复辅音和唇化音, 这是阿洪傣文和德宏傣文在辅音历史层次上最为明显的相同之处。

(4) 在韵母中也有不少的相似之处。阿洪傣文中的元音/i/可以分别表示/i/, /e/和/ɛ/; 元音/w/表示/w/和/ɛ/; 元音/u/表示/u/和/o/; 这与德宏古傣文的韵母用法相同。

通过以上阿洪傣文和德宏傣文在语言类型形态的四个方面的比较, 不难看出, 阿洪傣文和德宏傣文的文字来源一致, 语言的使用和词语的结构相似度极高。由此说明阿洪傣族和德宏傣族在历史上是同根同源民族。

三、中国云南傣族与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母语教育的异同

任何国家的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都是由国情决定的。在民族众多的国家里, 民族关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语言的使用、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的关系。换句话说, 民族关系的状况决定着语言的发展方向和语言的变化特点。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是实现国家语言能力的主要途径, 是一种战略资源, 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竞争中的地位, 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多个方面。可见, 民族母语的传承教育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云南傣族与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母语教育的相似性

中国云南傣族和印度阿萨姆邦傣族在母语教育方面有着历史上的相似性和现实上的差异性。就相似性而言, (1) 中印傣族都是同根同源民族, 同属中国古代“百越”支系民族, 他们在历史上形成了有着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共同社会文化的民族群体。^[7] (2) 由于语言同源, 因而思维方式和文化传承模式相同, 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也相同, 他们大多数信仰小乘佛教上座教。

(3) 在中国德宏傣族迁徙到印度阿萨姆邦相当一段时期里, 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族与中国德宏的傣族一样, 一直保留着本民族母语教育传承的传统模式, 当时傣族的母语教育一方面通过学校、寺庙和对外合作交流进行, 另一方面通过家庭生活和社区活动来实现, 后来随着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中印两国的跨境傣族的母语教育也随之产生了不同的发展和变化。(4) 历史上中印两国的傣族对傣语和傣族文化都有强烈的认同。在傣族早期历史上, 印度阿萨姆邦傣族的先民曾生活在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杂居地, 那个时候傣族母语处于强势语言地位, 他们和中国云南当地的傣族一样, 对傣族母语的教育和傣族的文化传承信心十足, 态度积极, 心理充满自豪感。后来, 由于傣族历史社会的变迁和傣族族群内部组织的变化, 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傣族对本民族的母语及母语文化的认同、母语使用、母语态度、母语忠诚度等方面产生各自不同的变化。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由于时空和地缘关系的变化, 中国云南德宏傣族与印度阿萨姆邦傣族在母语教育上发生各自不同的变化, 逐渐形成了一些差异, 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现实特征。

(二) 中国云南傣族与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母语教育的差异性

在中国, 傣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 傣族母语的传承教育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 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 1954 年的宪法就明确规定: “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经过六十多年发展, 中国傣族的母语文化传承教育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和模式, 并且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政策保障。在国家正确的语言政策支持下, 民族自治地区结合本地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实际,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保

障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傣族集中分布的云南有关市县，尤其是傣族自治州市县，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直开设傣语小学或傣汉双语小学，有的地方院校还开设傣语专业高等层次的教育模式，使绝大多数的傣族少年儿童从小就有接受学习母语文字和母语文化学习教育的机会。

（2）措施到位。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已形成从傣语初级教育到傣语专业化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接受过民族母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各个层次的升学中均有政策性照顾。特别是在高考升学和就业方面的照顾，使少数民族母语传承教育得以持续发展。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云南地方高校专门为傣族自治州市县培养输送傣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生 2500 名。近年来，地方政府与高等院校合作，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专门人才，要求参与此项计划的学生，在当年高考时要加试民族语作为高等院校录取的主要条件之一，同时进入此项计划的学生要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大学毕业必须回原来所在的边疆民族地区工作，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专业人才的特殊作用。

（3）拥有和谐生态的语言生活环境。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党和政府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活环境建设。在云南傣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建立了省、市、县、乡四级广播电台或广播电视站，在傣族自治州市县还建立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城市乡村公共场所的公示语和宣传标牌一律使用汉-民双语或三语，有的地州还有专门的民族出版社和民族语文报刊社。改革开放后又建立了地方性的民族语电视台和民族电影制片厂，为广泛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普及民族母语的传承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取得了积极良好的社会效应，创建了和谐生态的语言生活环境，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传承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条件。

在印度，印度的阿洪傣族大约在中国元朝年间迁徙到印度阿萨姆邦，从此离开了他们熟悉并习惯了的生活环境，远离傣语（母语）作为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强势语言社区，进入到一个新的以其他语言（印地语）为强势语言的社区，加上受当地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使得本民族的母语功能开始逐渐衰退，本民族母语的社会地位从强势语言圈蜕变为弱势语言圈，有的支系傣族的母语核心成分被当地主体民族的语言所取代，甚至有的支系傣族的母语出现了濒危或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阿洪傣族的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举步维艰，其母语教育的传承格局与中国傣族母语教育传承的格局差别甚大，大致有三个明显不同的方面。

第一，印度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与中国大不相同，因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国情不同，从而形成的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针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民族语言教育格局，成效也不尽相同。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民主共和国家。全国有 100 多种民族，其中人口较多的民族有：马拉提族、孟加拉族、比哈尔族、泰固族、泰米尔族等。印度政府规定，新闻媒体广播电台对内使用 24 种语言和 146 种方言播音。对外使用 27 种语言广播。相对人口较多的民族来说，印度的阿洪傣族在印度不属主体民族，阿洪傣语一直处于弱势语言群体，且多年来印度从国家民族政策层面上对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和母语文化的保护传承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律支持保障系统，所以阿洪傣族的母语传承教育基本依靠社会和民间的力量来开展，结果导致区域内不同傣族支系的母语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由于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专门的法律支持保障体系的支撑，所以地方和民间的组织领导者之间对本国傣族母语的教育发展理念和所持态度分歧较大，造成少数民族教育专项经费来源没有保障，最终形成“各自为阵”“单打独斗”格局。

第二，母语教育的基础条件薄弱。在印度阿洪傣族相对集中的阿萨姆邦，仅有两所地方院校（迪布鲁格尔大学和夸瓦迪大学）开设有印度傣语研究所和印度傣语言文化教育本科专业，在阿萨姆邦总人口近 2000 万的区域内每年只能招收到 30 名左右的傣语专业本科学生。所以在傣语人才培养和傣语师资培养方面难以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合作交流的现实需求。加之一些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印度傣族母语教育从初等层次到中等层次反复出现“散兵游勇”的“非良性循环”的态势，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从而直接影响到从中等层次到高等层次的母语教育体系的构建，最终导致民族母语教育的师资和母语专门化人才的培养以及本族母语教育传承的格局出现了“支离破碎”的状况。

第三，印度阿洪傣族的母语教育模式与中国云南不同。在印度阿洪傣族社会里的傣族语言生活处于“亚健康”状态。据笔

者 2015 年 1 月在印度阿萨姆邦实地考察的结果表明,阿萨姆邦阿洪傣族集中分布的莫兰区,没有傣语专门的报刊机构和新闻传媒机构,社区的公共场所的公示语言也没有傣文呈现,没有任何公办或私立的正规的傣语文的双语小学和中学。自 2000 年以来,有一位迪布鲁格尔大学法政学院的退休教师格因·福甘博士(系阿洪傣族的后裔)在莫兰城区创办了一所私立的初级阿洪傣语培训学校,每期招收 15 名社会成人学员,有时只能招到 8~9 名学员,进行傣语入门基础培训,每期培训时限为一年,资金来源靠社会慈善和募捐,由于培训经费紧张,师资不稳定,所以培训学校的运行举步维艰。他邀约了 5 位年长的阿洪傣族老人在当地社区创办了《印度傣学学刊》(不定期发刊)。有一位名叫古戈依·海特姆德的阿洪傣族学者于 2014 年在当地公开出版了《阿洪傣语、阿萨姆语、印地语、英语四语对照词典》,力图抢救正在濒危的阿洪傣语文化。所以阿洪傣语的普及教育和语言的使用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处于“零星点缀”状态,甚至在有的阿洪傣聚居区出现了严重的“母语濒危”现象。

通过以上中国云南傣族与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母语教育的异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客观公正性和优越性。国家民族政策的科学发展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实现的边疆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区域安全、少数民族的社会语言生活环境健康生态和谐的根本保证。同根同源民族在维护和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教育的过程中,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社会语言生活现实状况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和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中印跨境傣族母语教育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印度傣族人口不算少,但印度阿洪傣族母语教育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比中国要相对滞后。其主要原因是印度的少数民族分布复杂,处于弱势语言群体的阿洪傣语无法满足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阿洪傣族集中分布区域内使用阿洪傣语的人口相对少,阿洪傣语教育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加之印度的语言国情和国家民族政策以及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存在诸多不够完善的方面。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 语言政策是实现国家语言能力的主要途径,同时它还是一种战略资源,关系到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竞争中的地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多个方面。

(2)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仅要强化语言目标而且还要强化文化目标,这样有利于排除文化冲突和障碍,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目标,有利于开展国际间跨越时空的民族关系再生与修复,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3) 深入研究和关注少数民族母语传承教育既有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有探索民族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云南傣族学会. 傣族文化研究论文集[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 [2] 郭静, 等. 云南少数民族概览[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3] 蔡小晃. 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文化交流[A]. 国际会议论文集[C]. 中国瑞丽, 2015.
- [4] 李强. 傣语语音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 [5] 杨光远. 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6]周耀文, 罗美珍. 傣语方言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